

超越“人际影响”： 米尔斯的迪凯特研究与传播想像

秦艺丹

摘要

迪凯特研究并非拉扎斯菲尔德偶然的知识生产，而是一项范式下的解谜活动。作为迪凯特调查早期的研究主管，米尔斯由于不符合拉扎斯菲尔德的范式承诺与知识目标而被半途解雇。米尔斯与拉扎斯菲尔德这段并不愉快的传播研究“往事”产生了两个意外结果。首先，源于此次亲身合作，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将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研究知识判定为“贫乏的”，并着重从学理层面对这一判断进行了论证。其次，米尔斯将迪凯特调查的经验材料运用到了《权力精英》等著作中，并形成了与《人际影响》截然不同的传播想像。从迪凯特调查重新出发，文章认为米尔斯所说的方法论的抑制正是拉扎斯菲尔德等无法完成概化知识生产的根源；超越《人际影响》，米尔斯为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了一条历史-比较的研究路径，大众传播时代的民主建构问题成为其传播想像的核心。

关键词

米尔斯、方法论的抑制、权力精英、文化机器、公共领域

作者简介

秦艺丹，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福特汉姆大学访问学者。电邮：
18883362845@163.com。

More than Personal Influence: C. Wright Mills's Decatur Study and His Ideas on Communication

QIN Yidan

Abstract

Decatur Study is basically a puzzle-solving activity under Lazarsfeld'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radigm. Due to this reason, C. Wright Mills, the research manager of Decatur Study, was fired because he did not satisfy Lazarsfeld's paradigm promises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goals. This unsuccessful cooperation experience has generated two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Basing on this experience, Mills judged Lazarsfeld'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s trivial and

offered a very insightful explanation of this conclusion in his well known book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Using the empirical materials of Decatur Study, Mills developed his own ideas on communication in *Power Elite* which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Personal Influence*. Restarting from the Decatur Study, this paper claims that methodological inhibition is a main reason for the dominant paradigm's failure of constructing generalized knowledge; Surpassing *Personal Influence*, Mills offered a comparative-historical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pproach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 era as its focus.

Keywords

C. Wright Mills, Methodological Inhibition, Power Elite, Culture Apparatus, public sphere

Author

Qin Yidan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of Jinan University and a visiting scholar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of Fordham University. Email: 18883362845@163.com.

一、问题提出：米尔斯的迪凯特研究

旨在对《人民的选择》（*People's Choice*）一书中提出的意见领袖的个人影响及“两级传播流”理论进行经验确认，1945年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后称拉氏）及其应用社会研究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开展了迪凯特调查（The Decatur Study）。时隔十年，迪凯特调查的最终成果以《人际影响》（*Personal Influence*）为名出版。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知识史中，《人际影响》处在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备受争议的位置上，它通常被视为媒介效果从强大效果论到有限效果论的转折点。不过，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各类学术话语中，《人际影响》的本来面目已经越发模糊了。然而，纵观以往对这段知识史的反思，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被忽视了。这个人就是查尔斯·米尔斯（C. Wright Mills）。对于传播研究领域而言，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中对拉氏研究实践的批评并不令人陌生。不过，很少为人们注意到的是米尔斯此前在迪凯特调查中的研究主管身份。当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与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均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Geary, 2009: 77）。后来，由于与拉氏产生分歧，米尔斯被半路解雇。

米尔斯与拉氏的这段传播研究“往事”对于传播研究至关重要。2008年，在国际传播学协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第五十八届年会上，安德烈亚斯·科勒（Andreas Koller）提出，如果当时延用了米尔斯的思路，不仅社会

学不会抛弃传播研究，而且还可以规避传播研究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后所面临的约翰·彼得斯（John D. Peters）提出的“知识贫困”问题（Koller, 2008: 3）。科勒所说的，不仅仅是米尔斯对拉氏传播研究实践的反思与批评，更是米尔斯本人的传播想象。在科勒看来，米尔斯的传播思考与拉氏不同，它既是“历史性的传播哲学与理论”，也是“理论化的传播与媒介史”（Koller, 2008: 28）。科勒对米尔斯的赞誉并非没有道理。就后来实证主义传播研究遭遇的知识困境来看，米尔斯在50年代末的批评可以说是颇具预见性的。并且，近二十年来，传播研究的另类叙事也都开始为米尔斯的传播思想留下一席之地（Peters & Simonson, 2004: 263-264; Timothy Glander, 2000: 220-226; 麦克切斯尼, 2007 / 2009: 67-68）。由此，重返迪凯特调查成为必要。

为了确定购物、电影选择、时尚以及公共事件这四个领域的意见领袖及意见影响流，研究者在迪凯特市确定了由800名女性组成的随机样本，并在1945年的6月与8月分别对这些样本前后开展了两次调查。以公共领域为例，调查者对样本依次提出三个问题：“最近是否有人就国际、国内或社区事务征求过你的意见”；“你最近是否在政治或公共事务上改变过意见”；“你知道有人一直关注着新闻，并且你信任让他们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吗”。基于上述问题，调查组找到被访者提到的影响者 / 被影响者进行后续访谈以确认意见影响的真实性。1946年，在美国科学发展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上，米尔斯分析了三种确认意见影响的可能路径：其一，以第一个问题直接确定自我指认的意见领袖；其二，以第二个问题及其后续访谈确定具体的“影响流动”（flow of influences）；其三，以第三个问题确定“影响结构”（structure of influence）（Mills, 1946a）。米尔斯提出，如果关注具体的影响流动，那么可以依靠第二个问题，即微观研究方法；如果关注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影响结构，则可以依靠第三个问题，即宏观研究方法。

源于对结构问题的兴趣，米尔斯需要的是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影响结构。当时，受二战影响，米尔斯担心“集权社会结构”在美国兴起（Geary, 2009: 51）。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对韦伯（Max Weber）社会学的研究为他提供了基本的问题视野与方法论工具。由此，米尔斯主张对社会整体进行宏观结构分析，以考察不同阶级的“权力机会”（Gerth & Mills, 1942）。在米尔斯到达研究局时，迪凯特研究的前期设计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不过，米尔斯并不太满意。对于迪凯特调查的前身《人民的选择》，米尔斯（Mills, 1946a）毫不避讳地指出，它“不太结构化”，连调查地区的“权力系统或政治党派组织”都没有提及。就迪凯特调

查而言,米尔斯想要探究的是“关于一座城市的影响结构图像或模型”(Mills, 1946a)。由此,米尔斯为迪凯特调查增添了一个问题:影响流倾向于在每一阶层水平流动还是倾向于在不同阶层之间由上至下垂直流动。

不过,米尔斯起初一直致力于以微观方法来验证宏观方法,期望具体事务上的意见影响流能够与意见影响结构相互印证。然而,他很快发现,微观方法根本无法判断谁是意见领袖、谁是跟随者,因为即便某人承认他在某一具体事务上受别人影响,并且这个被提及的人也确认了影响的存在,但这仅仅只能说明两人卷入了一场意见交换中,这种意见交换可能再次发生,也可能仅仅发生一次(Mills, 1946a)。换句话说,即这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并不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来保证影响者是意见领袖,被影响者是跟随者。¹而对于回答意见影响流的方向这一问题,米尔斯发现微观方法也是一场“悲剧”:一方面,具体的意见影响流没有足够多关于意见交换的案例用以作出可靠的分析;另一方面,具体的意见流不够长——每一意见流只涉及三个人(Mills, 1946a)。而就宏观方法来看,依据第三个问题及其后续访谈,米尔斯共有能够提供意见领袖的名字的样本、组一(被样本提及名字的意见领袖)、组二(意见领袖的意见领袖)、组三(意见领袖的意见领袖的意见领袖)四个人组成的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影响链。²依据宏观方法,他得出结论:政治领域的意见影响是垂直分布的。

针对政治领域的意见影响状况,米尔斯曾进行过大量的定性分析。根据理查德·吉勒姆(Richard Gillam)的叙述,米尔斯曾在一份300多页的报告中写道,“不仅仅是‘影响’和‘意见’,而更多的是清晰可辨的‘意识形态’……将它与制度及阶层结构关联起来。”(转引自Gitlin, 1978)可惜的是,目前已经无法找到这份报告了。此外,在哥伦比亚大学稀有书籍与手稿图书馆(Rare Books & Manuscript Library)的迪凯特研究档案里,有一份名为《四个领域意见与行动的分层及意见领袖》(*Stratification and Opinion Leaders in Four Areas of Opinion and Activity*)的报告。该报告写于1946年5月。尽管并未署名,不过当时负责撰写报告的正是米尔斯。³与《人际影响》不同,米尔斯尤其强调政治领域意见影响机制与其他三个领域的区别。具体说来,米尔斯认为,与其他三个领域相比,政治领域意见形成与付诸行动之间的鸿沟更大,并且改变意见或做出决定所产生的后果也更为重要。正是基于上述特征,米尔斯认为政治领域的意见领袖不必是日常群体活动(group activity)中的成员,意见影响流也能够呈现出由较高阶层向较低阶层流动的垂直性特征。

不过,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米尔斯发现,即便是较高阶层的人也普遍表

现出了政治冷漠的社会情绪。在米尔斯看来,这显然不是因为发生的事情对人们来说不重要——毕竟刚刚结束的二战、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政策在客观上的确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影响。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呢?米尔斯认为,由于人们在面对这些复杂而又严肃的事情时,形成的公共阐释通常是“混乱的”,并且也难以采取任何行动,因此便会感到“不安”和“焦虑”,并最后外化为冷漠(Mills, 1946b)。与此同时,他发现,其他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也基本处于这一状态,他们“奉命行事,但很少真正有自我意识地行动”(Mills, 1946b)。

对于米尔斯的上述分析,拉氏认为“非常失败”,并由此解雇了米尔斯(Horowitz, 1983: 80)。从《人际影响》来看,拉氏显然并不在意米尔斯对于以具体事务上的意见改变来确定意见影响关系这一方式提出的质疑。在确定何为意见影响、何为意见领袖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人际影响》就与米尔斯分道扬镳了——前者选择的正是以具体事务上的影响者作为意见领袖,即所谓的“特定影响者”(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2016: 151)。基于对影响者的界定,《人际影响》进一步将研究对象严格地限定为态度的“短期变化”与“面对面影响”(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2016: 151)。拉氏并非不明白这一限定可能会面临的指控。拉氏说,“但愿没有读者会把我们目前的谨慎与节制视为对大问题和问题复杂性的漠视。”(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2016: 151)不过,从拉氏对影响问题的实际处置方式来看,这一说法无疑更像是一种托辞。

在与拉氏分道扬镳以后,米尔斯开始对拉氏的研究实践提出批评。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将拉氏的传播研究判定为“贫乏的”(米尔斯,1959/2005: 68),并着重从学理层面对这一论断进行了阐释。与此同时,米尔斯还将迪凯特调查的材料运用到了《白领》《权力精英》等著作中。根据库尔特·朗(Kurt Lang)和格拉迪斯·朗(Gladys Engel Lang)的叙述,米尔斯开展迪凯特研究的本意实际上是“通过人际关系网来追踪媒介影响流”,而不仅仅止于描述人际间的传播流(Lang & Lang, 2006)。在迪凯特研究中,米尔斯曾推测,美国正处于“单一的民主社会”与“大规模专制社会”之间(Gitlin, 1978)。通过迪凯特研究,米尔斯想要建构出一套“政治传播理论”(Gitlin, 1978)。延续这一思考,与《人际影响》关注意见领袖的人际影响不同的是,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着重回应的是大众传播时代的民主问题。颇为有趣的是,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权力精英》也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只不过,传播研究最后选择的是《人际影响》。

基于此,本文将从迪凯特调查重新出发,试图还原以下三个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其一,拉氏为何没有采用米尔斯的分析路径?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能够在最大程

度上接近拉氏开展迪凯特研究的真实意图及其传播研究范式的实质。其二，从迪凯特调查到《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何以得出拉氏传播研究无法完成概化知识生产这一判断？这一知识／理论生产困境直接指向了传播研究的学科合法性问题，而这正是长期以来萦绕在主流传播研究共同体心中的噩梦。其三，从迪凯特调查到《权力精英》，米尔斯是如何回应大众传播时代的民主危机这一传播研究的经典命题的？

二、被解雇的必然：作为解谜活动的迪凯特研究

从表面上看，米尔斯的迪凯特研究与《人际影响》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前者强调的是政治领域意见影响结构的垂直性分布，后者则着重凸显了商业领域意见领袖的水平分布以及“两级传播流”理论。目前，大部分传播研究者在回顾这段分歧时，都倾向于认为米尔斯被解雇是因为他对政治领域意见流动的归纳无法满足迪凯特调查赞助者麦克凡登出版公司（Macfadden Publication Inc.）的需求。这一判断并非全无道理。作为一项受商业资助的研究，迪凯特调查无疑需要满足其赞助商的需求。当时，由于在迪凯特调查中的失败，社会学系暂停了米尔斯的升职计划。在西奥多·阿贝尔（Theodore Abel）与林德向米尔斯宣布这一决定的信中，两人写道，迪凯特研究并非米尔斯与拉氏之间的“私人合同”，而是与整个社会学系密切相关，因为依靠社会学系来赞助研究局是“极为困难”的（Horowitz, 1983: 80）。当时，麦克凡登出版公司正为其杂志《真实故事》无法招揽到广告发愁，该杂志的主要受众为低收入人群。通过“兜售”意见领袖的水平分布与“两级传播流”理论，拉氏成功拉到了赞助（Morrison, 2006）。

事实上，就彼得·西蒙森（Peter Simonson）的考察，在迪凯特调查还未展开时，拉氏与麦克凡登出版公司就已经在Printer's Ink杂志上对意见领袖的水平分布与“两级传播流”理论进行过非常暧昧的表述（Simonson, 2006）。此外，在迪凯特调查档案9号、10号箱子里，还珍藏有数份由麦克凡登出版公司制作出版的幻灯片、画册、广告复本。无一例外地，尽管这些材料几乎出自1946年，但意见领袖的水平分布及“两级传播流”理论均以非常确定的方式被呈现出来。毫无疑问，一旦采用米尔斯的视野凸显政治领域的意见流动状况，将意味着上述结论的重大失败。况且，麦克凡登出版公司感兴趣的本来就是商业领域而非政治领域。

不过，作为一项学术生产活动，拉氏开展迪凯特调查的主观目的并不在于服务商业目标，米尔斯的失败也不仅仅是无法兑现商业承诺。更为根本地，米尔斯无法满足的是拉氏的知识兴趣与知识承诺。究其本质，迪凯特研究并非拉氏偶然的知识

生产,而是在严格的谜题设定及理论、方法论目标下开展的范式“解谜活动”(库恩,1996/2003:32)。从表面上看,迪凯特调查的问题来源是研究人民投票行为的伊里县调查。不过,更为本质地说,伊里县调查与迪凯特调查都是为了探究个体短期态度改变这一谜题而开展的研究(Simonson,2006;罗杰斯,1997/2002:259-260)。在拉氏这里,迪凯特研究实质上就是对人际关系作为影响个体态度改变的一个新的中介因素的确认,其目的则在于抵达对“人们是如何做决定的”这一谜题的进一步理解。可见,米尔斯对意见流动社会阶层结构的分析并不是拉氏开展迪凯特研究的目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的《人际影响》才选择了将具体事务上的“特定影响者”界定为意见领袖,并将研究对象限定为态度的“短期变化”与“面对面影响”(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2016:151)。⁴

基于如上谜题,拉氏开展迪凯特调查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理论诉求,即从不同领域对意见领袖的人际影响及“两级传播流”理论进行确证,从而扩大该理论的适用范围。在《人民的选择》中,该理论是在政治领域被提出来的,因此还不具备普适性。通过对该理论进行一般性确认,拉氏最终想要推进关于个体短期态度改变研究的概化理论的发展,他将这称为“社会研究要达成的理论表述”(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高德特,1944/2012:30-34)。在《人民的选择》1948年的第二版序言中,拉氏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将意见领袖的人际影响与“两级传播流”理论以非常确定的方式陈述出来——尽管此时米尔斯已经提出了经验事实中的诸多不一致。因此,除了客观上需要满足商业需求,源于对概化知识的追求,拉氏主观上也不见得愿意放弃这一假设。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拉氏更为直接地指出,对概化知识、“整合概念”的建构是经验研究获得合法性的必要步骤(Lazarsfeld,1969:283)。

颇为隐蔽的是,迪凯特调查对《人民的选择》的延续不仅仅是问题、理论层面的,同时也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对于迪凯特调查,拉氏还有着明确的方法目标。作为罗杰斯所说的“工具制造者”(罗杰斯,1997/2002:287),拉氏一直致力于对固定样本调查法(panel study)进行一般性确认。在《人民的选择》的第二版序言中,拉氏提出,未来研究应该迎接方法论性质带来的挑战,即“弄清固定样本方法的价值和局限性”(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高德特,1944/2012:36-37)。比如,一个固定样本能够持续多久?在哪些论题上重复访问可以使用该方法,在哪些论题上不可以?尽管这一问题是拉氏本人抛出来的,但他又立即给出了确定性的答案:“在伊里县研究初期,我们就清楚,重复访问绝不限于政治宣传研究。它是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可用于任何一项对一段时期内的态度形成的研究。”

（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高德特，1944 / 2012：37）拉氏暗示，研究就应该解决固定样本调查法在各种不同议题的研究中的应用（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高德特，1944 / 2012：36-37）。而在第三版的序言中，他更是颇为得意地宣告，固定样本调查法已经成为了社会研究方法的“既定组成部分”（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高德特，1944 / 2012：7）。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在《人际影响》的新版序言中特别提到，“从方法论上看，迪凯特调查完全是拉扎斯菲尔德式的，它将拉氏在选举研究中的创新性设计拓展到其他决策制定领域。”（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 / 2016：3）

对于拉氏的固定样本调查法及后续访谈技术，米尔斯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认为它们也许能够成为“沟通起宏观研究路径与微观研究路径的桥梁”（Mills，1946a）。不过，从根本上来说，米尔斯更欣赏的是不依赖于固定样本而对各个阶层开展深入访谈的调查方法。米尔斯提出，以搜集大量定量数据为宗旨的研究势必会牺牲对社会现象的深入理解。在一封给汉斯·格斯（Hans Gerth）的信中，米尔斯坦言，比起做“3000个半个小时的访谈”，他更愿意做“100个深度性的、长达5小时的访谈”去获取一个详细的样本（转引自Geary，2009：90）。他希望能够开展55个深度访谈来“建构一幅关于迪凯特市各个阶层的图景”，并在大量数据中植入对“人们是如何做决定的”这一问题的定性分析（转引自Geary，2009：90）。当时，米尔斯的确开展了45个开放性访谈。

对于米尔斯的这一行为，拉氏非常不满，这正是他后来对于解雇米尔斯一事给出的说辞：“米尔斯在从共同体的领袖——诸如报纸编辑、城市官员——那里收集有关迪凯特的共同体权力的资料的同时，忽略对于调查样本的技术监督”（罗杰斯，1997 / 2002：313）。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采用米尔斯后期的分析路径，固定样本调查法将失去其意义——米尔斯确定意见影响流及意见领袖的路径并不会对样本进行重复访问。不仅如此，米尔斯当时还专门给拉氏写过两份有关方法论的备忘录。米尔斯提到，量化操作中的定义本身就对研究结论有着巨大影响（Mills，1946c）。除此之外，米尔斯还提出，仅仅依靠量化统计方法很难有效地回答宏观问题，因此在研究单位增大时应该使用“历史的、跨文化分析”（Mills，1946d）。

由此可见，不论从研究问题、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来看，米尔斯都不满足迪凯特调查的知识生产要求。如果说，拉氏解雇米尔斯是源于迪凯特调查的“解谜”本质的话，那么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米尔斯无法向拉氏妥协也是基于其根深蒂固的知识承诺。作为一个出身于实用主义哲学怀抱，后又深受曼海姆（Karl

Mannheim) 知识社会学、韦伯社会学熏陶的社会学家, 米尔斯对于何为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应该为何的界定要远比拉氏、甚至默顿等更为宽广。⁵米尔斯曾表示, 他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即深入“揭示主导思想(dominant idea)背后的利益问题”(Geary, 2009: 41)。与这一知识目标相匹配, 在研究方法上米尔斯强调以“历史性的、比较性的”视角来考察宏观社会结构(Geary, 2009: 7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丹尼尔·杰瑞(Daniel Geary)认为, 米尔斯与拉氏的根本分歧在于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关于社会科学边界及目标的想象。

事实上, 早在40年代初, 米尔斯就对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行为科学路径”提出过质疑(Geary, 2009: 50-51)。在米尔斯看来, 尽管这种研究路径具有一定的价值, 但总体上仍然是“贫瘠”的, 因为它通常局限于小规模“田野分析”, 缺乏对“更大的社会结构及历史特征的关注”(Geary, 2009: 50-51)。当时, 米尔斯主张将美国经验导向的研究与德国理论导向的研究结合起来。可以说, 迪凯特调查正是对这一观念的亲身实践。显然, 结局并不圆满。1953年, 米尔斯发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风格》(Two Style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一文。延续在迪凯特调查中的说法, 米尔斯在这篇文章中将拉氏的研究风格称为“微观研究”, 并主张研究者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来回“穿梭”(Mills, 1963a: 563)。不过, 这一时期的折衷主义并非米尔斯最真实的态度。从1954年在《理想的社会学: 研究技艺、现实关照与人文主义的结合》(IBM Plus Reality Plus Humanism = Sociology)一文中将拉氏称为“科学家”(Mills, 1963b: 569), 到1959年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将拉氏的研究概念化为“抽象经验主义”(米尔斯, 1959/2005: 54)。米尔斯在50年代后半期对拉氏研究实践固守于量化操作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后果作出了明确的逻辑阐释与价值判断。

三、方法论抑制: 断裂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知识的琐碎化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 米尔斯对《人民的选择》《人际影响》等一系列重要传播研究文本均进行了严肃检视。米尔斯(米尔斯, 1959/2005: 55)认为, 这些研究的研究框架大都局限于“谁通过何种传媒告诉谁什么事, 产生了什么结果”。在米尔斯看来, 这一大众传播效果研究框架是非常成问题的。首先, 在这一框架下, 对诸如“公众”“舆论”等核心研究对象的概念化及问题化方式脱离了其存在的历史序列与社会结构, 因此根本无法抵达对舆论、大众传播效果的实质理解。其次, 对政治动力机制的“正当性”的讨论在上述框架中也是缺席的。比如, 《人民的选择》旨在对人民的选举行为进行全面理解, 但它却没有对与选举行为密

切相关的政治机器、政治制度作出任何阐释（米尔斯，1959 / 2005：56-57）。而在米尔斯看来，“正当性”是研究舆论、意识形态等政治学议题的核心思想（米尔斯，1959 / 2005：57）。由此，米尔斯得出结论，上述关于不同个体受不同媒体影响的研究对广告业有用，但对于理解“大众传媒的社会意义的理论的发展”还构不成充分的基础（米尔斯，1959 / 2005：56）。

那么，拉氏及其研究局的传播研究何以如此呢？米尔斯将主要原因归纳为“方法论的抑制”，即在研究中以科学方法严格地限定研究问题的选择和对问题的表述方式（米尔斯，1959 / 2005：61）。比如，米尔斯看到，起源于古老社会的“公众”问题被以研究方法界定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总体”，由此便可以进行“统计抽样”；如果公众持有观点，那就通过交流来发现其观点，如果他们不愿意或不能说，那就使用“投射和量表手段”（米尔斯，1959 / 2005：55-56）。如此一来，米尔斯发现，在受“方法论的抑制”的研究实践中，研究问题不仅仅由于需要适应量化统计的需要而抽象层次较低，更重要的是由于“固守于小规模的区域并且倾向于心理主义”，这些抽象层次较低的问题以及为此建构的变量并不是基于对社会进行系统考察、历史分析后得到的，因而根本不具备与结构问题的一致性（米尔斯，1959 / 2005：7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尔斯将拉氏的研究实践称为“抽象经验主义”。由此可见，米尔斯本人并不反对经验研究。恰恰相反，源于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知识背景，米尔斯非常强调研究的经验性，只不过这种经验研究是“视野开阔得多的经验主义”（米尔斯，1959 / 2005：72）。在米尔斯看来，由于对量化统计的狂热，拉氏的经验研究实际上已经被抽空了，因而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经验性。

米尔斯的批评不无道理。基于“个体是如何做决定的”与固定样本调查法这两个互为对照的问题与方法，《人际影响》提出，大众媒介研究最重要的旨趣是“探究大众媒介在短期内影响（通常是改变）意见或态度的有效性”（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 / 2016：17），大众媒介研究的知识发展历程则被操作化地描述为“不断在大众媒介和受众之间引入中介因素的过程”（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 / 2016：41），而迪凯特调查即是一项旨在对人际关系作为一个新的中介变量进行验证的研究。在这一视野下，不论是前期对影响问题的处置方式，还是后期关于人际影响的理论建构，《人际影响》都显示出了极为狭隘的“刺激-反应”传播观。以特定事件上的短期效果作为研究对象，在比较人际影响与大众媒介影响时，迪凯特调查的问题化方式为“是谁或什么促使你做出这一改变？”（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 / 2016：299）在这一问题下，人际影响与媒介影响均被视为能够直接促

进态度/行为改变的刺激因素。与此相对应地,个人,尤其是意见领袖,被称为“大众传播系统中的另一种媒介,就像杂志、报纸和广播一样”(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2016:9)。对于《人际影响》来说,人际关系介入大众传播过程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意见领袖的人际影响既可以直接屏蔽来自大众媒介的信息,也可以充当与大众媒介一样的刺激,在群体内部直接引发反应。

很明显,《人际影响》与其暗示的民主意义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断裂。彼得斯提出,“两级传播流”理论看似能够极大地满足人们关于民主社会的想象,但实际上《人际影响》却没有对“共同体讨论为何重要”这一问题作出任何解释(Peters,1989)。在彼得斯看来,《人际影响》所说的人际间的交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讨论,而只是充当了媒介流的“渠道”(channel)(Peters,1989)。在这一问题上,米尔斯本人的解释就极为不同了。基于迪凯特调查,米尔斯在1950年写过《大众媒介与公共舆论》(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一文。由于当时还尚未与拉氏“彻底决裂”(Mills, K. & Mills, P., 2000: 172),米尔斯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了对人际影响的极大妥协——承认初级群体讨论在美国社会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从表面上看,米尔斯得出了与《人际影响》一致的结论,但实则不然。在米尔斯这里,媒介接触与人际交谈存在着两个重要区别:其一,与“媒介接触”(media exposure)相比,人际交谈具有较小的自主选择性:受众可以通过关掉广播或放下杂志来拒绝不喜欢的大众媒介内容,但这在人际交谈中却并非易事;其二,与大众传播相比,在人际交谈中,谈话者能够更加容易地进行“反驳”,也即存在不同意见的“互动”(give and take)(Mills, 1963c: 595-596)。如此一来,尽管意见领袖更多地接触媒介并试图将其意见传输给群体内的成员,但由于这些成员能够接触到持有不同观点的意见领袖,因此便能够对不同意见进行对比,从而形成对大众媒介信息的有效抵制。由此,初级群体间的讨论才具备了意义。

那么,如此一来,“抽象经验主义”将走向何方呢?米尔斯注意到,精确性通常是这类研究的辩护依据。不过,尽管赞同研究者应该在研究中尽可能地保持精确的态度,但与此同时,米尔斯提醒我们,精确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概念。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在迪凯特调查中,米尔斯曾发现量化操作中的概念界定对于研究结论有着重要影响。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他更进一步地将其表述为:“如果你曾花费一、两年的时间,严肃地研究过数千小时的访谈,又经过精心的编码和键入,你就会发现原来‘事实’的范畴是何等易变。”(米尔斯,1959/2005:76)更何况,精确性与真相更是相隔甚远。

除了精确性,概化知识生产是“抽象经验主义”的另一个知识承诺。对此,米

尔斯更是给出了否定性的判断。米尔斯看到,以研究方法为先,“抽象经验主义”对经验资料与理论均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就前者而言,由于缺乏历史的、结构性的视野,所谓经验资料大都变成了“大量可重复、可度量的统计性的事实和关系”,因而根本难以触及经验材料的实质(米尔斯,1959/2005:70)。就后者而言,米尔斯更是发现,“抽象经验主义”的理论建构通常是在经验材料搜集好甚至“修润”好以后“炮制”出来的,而不是研究者事先在认真研究的前提下用以指导研究实践本身的(米尔斯,1959/2005:73)。在此情况下,理论也就沦为了“用于解释统计结果的变量”而失去了理论本身之于研究的意义(米尔斯,1959/2005:73)。米尔斯对拉氏理论生产过程的描述并非夸张。事实上,《人际影响》第一部分关于小群体理论的文献综述本来是卡茨写给福特基金会电视委员会的文章,后来被拉氏拿过来包装后重新使用。基于上述分析,米尔斯认为,尽管“抽象经验主义”看似赋予了研究以历史性、结构性意义,但在其一般性理论与统计事实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逻辑上的断裂。由此,米尔斯(1959/2005:72-73)才断定,“这些零碎的片段设计得无论多么精确,都不可能如此机械外在地结合起来。”

毫不意外,《社会学的想象力》激起了拉氏极大的不满。在一次采访中,拉氏说,“我认为米尔斯的东西非常荒谬……他为什么要批评?他为什么不放过我们?”(转引自Summers,2006)为了对自己研究中的“人文性”“定性”视角进行自证(Lazarsfeld,1972:vii),1972年拉氏专门出版了一本名为《定性分析:历史性与批评性文章》(Qualitative Analysis: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的论文集。米尔斯关于“抽象经验主义”的论述被作为批评文章编入其中。从拉氏为该文撰写的引言来看,他对米尔斯的批评显然是不屑的。然而,颇为有趣的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出版的同一年,在一系列舆论、传播研究与拉氏有过密切合作的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从传播研究的内部发出了“传播研究正在枯萎”的讣告(Berelson,1959)。贝雷尔森(Berelson,1959)说,先前二十年赋予传播研究领域活力的“伟大思想”几乎被“耗尽”了。对于这一现象,贝雷尔森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给出明确解释,只是提及拉氏等相继离开了传播研究,而其学生又未能超越老师们的思想这一事实。不过,就他此前为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大厦落成25周年纪念活动撰写的《公共舆论研究》(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一文来看,很难说贝雷尔森在这一现象上没有形成自己的判断。

在《公共舆论研究》这篇文章中,贝雷尔森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趋势下勾勒了公共舆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以1930年作为分界点,贝雷尔森看到,在此之后的公共舆论研究出现了“技术化”“量化”“非理论化”“区隔化”“专业

化”“制度化”“现代化”“群体化”的趋势（Berelson, 1956: 304）。简言之，即以行为科学为特征，美国化了。与米尔斯颇为一致，贝雷尔森当时也认为这一科学化趋势是由研究者赋予研究方法“支配地位”造成的（Berelson, 1956: 313）。在此情况下，“研究方法的掌握者”接替了“研究主题的知识拥有者”，研究方法僭越为研究目标，转而成为决定研究主题的关键因素（Berelson, 1956: 313）。对此，贝雷尔森表现出了颇为折衷的立场——他说，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这种现象既可以被“赞许”，也可以被“谴责”（Berelson, 1956: 313）。不过，在这一表面的折衷主义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贝雷尔森对研究科学化趋势下理论创造力问题的焦虑。在对公共舆论研究科学化进程线性描述的终端，贝雷尔森表达出了与拉氏相同的对普遍化知识的期待。不过，检视当下，他也不得不承认，“过去二十年的公共舆论研究搜集了大量的数据，但的确还没有形成理论。”（Berelson, 1956: 315）由此，贝雷尔森才反复呼吁舆论研究不应该抛弃政治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

以后来的知识史之见，米尔斯关于拉氏传播研究知识琐碎化及其根源的判断是颇为中肯的。汉诺·哈特（Hanno Hardt）认为，拉氏等相信“对事实的操纵最终能够导致理论的发现”实际上是“对方法论的痴迷”产生的“幻觉”（哈特，1992 / 2008: 18）。不过，如果说拉氏的传播研究只是一种个人或学术团体的选择的话，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却在建制层面上将“非经验性反思与真正的社会科学几乎毫无关系”这一思想固定下来（Peters, 1986）。历史证明，这一建制方式付出了重大的知识代价。从50年代到80年代，传播研究领域一直处于“呼吁更多的理论”的诉求中（哈特，1992 / 2008: 99）。直到1983年，美国《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专刊《领域的躁动》（*Ferment in the Field*）的出版，才使得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学术霸权、价值立场及其知识后果在建制层面上得到正式检视（王金礼，秦艺丹，2016）。此时，连施拉姆本人也对传播研究始终未能提出一个核心命题而感到失望：“传播学发展成了一门学科。但它是否产生了一系列核心的、互相关联的理论以使其实践者能够在此基础上建构统一其思想呢？”（Schramm, 1983）如果说，贝雷尔森在50年代末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传播研究的知识困境的话，那么米尔斯对于这一问题的阐述无疑更值得被认真对待。

四、从大众媒介到文化机器：公共领域的转型与民主的可能性

延续在迪凯特研究中的阐释框架，米尔斯在后来的《权力精英》中形成了与《人际影响》截然不同的传播想象。科勒提醒我们，大部分围绕《权力精英》的讨

论都集中于“权力精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这一“描述性问题”，但是却忽略了米尔斯对“为何会出现权力精英”这一问题所作的“因果解释”（Koller, 2008: 1-2）。科勒将后者概括为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后来在60年代才提出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科勒的这一归纳是切中肯綮的。与哈贝马斯相同，米尔斯也尤其强调传播方式的变革对于公共领域及民主的影响。将社会的主要传播方式视为判断社会民主程度的主要依据，米尔斯认为，在“公众共同体”中，讨论是占支配地位的交流方式，即便存在大众媒介，其作用也是“扩展”和“激励”讨论，从而将初级公众与其他讨论联结在一起；而在“大众社会”里，大众媒介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传播方式，公众则是暴露在特定媒介内容下的“媒介市场”（米尔斯，1956/2004: 386）。在米尔斯看来，大众媒介显然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传播方式，因而必须对其进行认真考察。上文提到的米尔斯在《大众媒介与公共舆论》中关于意见领袖个人影响的论述，实际上只是他向拉氏妥协而进行的一种伦理想象。在后来对大众媒介、公共舆论与民主的论述中，米尔斯甚至拒绝使用“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这一表述（Mills, 1963d: 371）。米尔斯暗示，拉氏意义上的意见领袖已经成为宣传家操纵的对象，是民主外衣下征服大众的手段。

对于大众媒介之于民主社会建构的意义，米尔斯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了颇为悲观的情绪。在查尔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等早期媒介观察家看来，大众媒介“无限地扩大了思想之间的竞争”，增进了“经典民主的交流活力”，并由此带来了“个体理性及自由的增长”。与这一颇为乐观的论断相反，米尔斯认为，彼时的大众媒介并没有担任起“扩大”或“激活”公众的角色，而是“消灭”了公众（Mills, 1963d: 362）。之所以得出这一论断，首先是因为米尔斯看到了大众传播固有的区别于人际传播的传播特征对于公众讨论的不利影响。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有过相关的论述。不过，除此之外，米尔斯更为强调的是大众媒介对于个体意识的影响。米尔斯（1951/1987: 371）说，“人的意识不能决定人的存在，人的物质存在也不能决定人的意识。介于意识和存在之间的，是（意识的）交流（或传播），它影响着人们对存在的意识。人确实会‘卷入某些独立于自己意志之外的确定而又必不可少的关系之中’，但是交流的介入，却能使那些关系的意义发生变化。”他（1956/2004: 394-397）看到，大众媒介不仅为观者提供了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和意义框架，还作为“自我形象的观察镜”将“读者、听众、观察者带进更大的、更高的参考群体视野”，从而塑造了观者的“本体意识”。不过，当对大众媒体的内容进行检视时，米尔斯（1956/2004: 394-397）发现，这些内容不论

是对外部世界的呈现，还是对个体自我意识的塑造，都是非常失败的，因为它们无法使个体以理性的方式来理解周围的世界及其自身，并由此给个体造成一种“心理上的茫然”。

由此，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才说，冷漠、焦虑的大众正在取代自由、理性的公众成为社会主要的人格类型，大众-权力精英的社会结构正在美国兴起。一言以蔽之，即美国的公共领域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民主由此成为问题。不过，米尔斯的大众传播研究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对于《权力精英》，有一个困扰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是否应该更加细致地考察美国的传播、文化产业？在《权力精英》中，米尔斯已经考察了军事、政治及经济精英，缺乏的正是对媒介、文化机构及知识分子的深入考察，后者与权力之间无疑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基于这一想法，他在50年代后半期开展了另一项研究项目，即“文化机器”（cultural apparatus）研究。对于文化机器，米尔斯给出的定义是“包含艺术、知识及科学工作得以进行的所有组织、环境，以及小群体、公众、大众使用这些工作的渠道”（Mills, 1963e: 406）。与对大众媒介的论述几乎一致，米尔斯也强调文化机器作为社会“观察哨”（observation posts）、“阐释中心”（interpretation centers）、“表征装置”（presentation depots）对于人的意识及其存在的中介角色。在文化机器研究中，米尔斯（1963e: 407）更为清晰指出，文化机器在人的“理性”（reason）、“感知”（sensibility）等“最包容万象的”领域以及“科学技术”等“最专业化的”领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此，文化机器成为人类与社会的“文明座位”（the seat of civilization）（Mills, 1963e: 407）。

在文化机器研究中，米尔斯确定了现代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一，文化机器始于赞助体系，受众基本上由其赞助者构成；其二，文化机器变成受市场驱动的企业，文化工作者成为企业家，受众由此变成“资产阶级公众”；其三，文化机器既受政治动机影响，也受商业利益驱使，受众成为“乐于接受的大众”（Mills, 1963e: 411-413）。米尔斯看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产业都存在着上述三种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机器。无一例外地，任何一个国家的权力阶层都致力于对文化机器进行吸纳，从而建构出有利于其权力运作的话语体系。不过，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米尔斯对文化工作者表现出了颇为乐观的情绪。当时，正逢欧洲新左派运动的兴起，匈牙利也掀起了反对苏联入侵的抵抗运动。1957年以后，米尔斯深入走访了东欧各国的文化工作者，并搜集了大量涉及各国抗争运动的报纸、杂志剪纸。与此同时，他在这一时期还与其读者保持着频繁的互动。这些经历极大地缓解了米尔斯先前在“快乐机器人”“大众社会”甚至是“高层的不道德”上的悲观论调

(Sawchuk, 2001)。由此,米尔斯修正了先前的研究意图——勾画“公众讨论向大众冷漠的退化”,并回归到其多年来在“思想在政治、社会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及知识分子的权力”这一命题上所作的思考(Geary, 2009: 189-190)。在这一时期,米尔斯逐渐将社会变革的主体从早期的知识分子扩展为包括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在内的泛文化工作者。

基于此,米尔斯(1963f: 232)呼吁,文化工作者要“收回”(repossess)“文化机器”以服务于自身的社会目标。米尔斯说,只有当文化工作者重新掌握“文化机器”时,才能够明白“社会中普遍的政治冷漠究竟是现代社会的通病,还是源于文化工作者的缺陷及其在政治领域的缺席”(Geary, 2009: 195)。可以说,从知识分子到大众媒介再到文化机器,实际上是米尔斯对思想/知识及其传播之于社会的构成性角色的不断确认。米尔斯本人将文化机器研究的思想起点追溯到1939年的《语言,逻辑与文化》(Language, Logic and Culture)与1944年的《无力的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The Powerless People: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Society)。在《语言,逻辑与文化》一文中,受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与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影响,米尔斯(Mills, 1963g: 433)提出,对思想及其社会相关性的揭示可以通过研究知识分子使用的语言来完成,因为语言被视为一种“社会控制系统”,传播则成为一种能够建立起“共同反应的模式”的实践。在《无力的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一文中,米尔斯(1963h: 299)呼吁,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利用“传播机器”,打碎“现代传播建立起来的关于观念与知识的刻板印象”,推进对重要社会议题的话语建构及社会辩论,从而创造出“新鲜的感知”。正如金·梭莱克(Kim Sawchuk)所言,米尔斯强调的始终是传播本身对于“人类境况”(human condition)的“构成性”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打破现状的可能性(Sawchuk, 2001)。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将社会变革的历史主体确认为文化工作者以后,民主社会具体应该如何才能构建起来呢?这一问题事实上也出现在米尔斯早期关于“真相的政治”(politics of truth)的阐述中。“真相的政治”是米尔斯用以表述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核心概念。具体而言,它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其一,揭示权威对公众理解社会现实进行操纵的权力;其二,质疑、挑战官方对社会现实的界定。不过,在吉勒姆(1975)看来,米尔斯似乎没有赋予“真相的政治”以任何“具体的内容”来指明社会变革及民主建构的具体途径。对于文化机器研究,杰瑞(2009: 196)也提出几乎同样的问题。杰瑞认为,米尔斯在文化机器研究中始终没有回答的是,被唤活的公众讨论究竟如何才能上升为制度层面的变革。

本文以为, 尽管米尔斯论述民主社会的起点是古典民主理论, 但他最后并没有完全回归到古典民主理论来通过公共舆论实现政府形式意义上的民主, 而是仅仅将落点放在了个体身上。在论述何为民主时, 以汉斯·斯培尔 (Hans Speier) 的定义为参照, 米尔斯 (1963h: 578) 说, “只有当非政府部门的公众要求就政治意见进行自由、公开的表达并以此来决定或影响政府的决策及行动时, 才能说公共舆论是存在的。”以公共舆论为标准, 米尔斯建构了作为民主社会的“公众共同体”与作为非民主社会的“大众社会”这两个极端社会类型 (米尔斯, 1956 / 2004: 386)。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在米尔斯这里, 不仅“大众社会”在当时的美国还不是现实, “公众共同体”更不具备存在的可能。米尔斯 (1956 / 2004: 382) 将后者称为一种“迷人的神话”、“对理想的追求”。米尔斯对“公众共同体”及“大众社会”的使用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极大影响, 其本质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作为一种“理想类型”, “公众共同体”“大众社会”只是一种用来“对现实进行比较、测量的概念工具” (Weber, 1963: 403)。对于个体之间始终保持着利益和谐、公众具有就复杂议题进行理性讨论的能力等一系列“公众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假设, 米尔斯均保持了质疑。

不过, 米尔斯并未因此宣告民主的幻灭。面对一个非全体民主的社会, 米尔斯 (1959 / 2005: 205) 主张“以民主的方式行事”, 通过这种做法来“努力消泯‘仿佛’, 努力使社会更加民主”。不过, 米尔斯在这里说的民主并非政府形式意义上的民主, 而更多的是个体层面的自我实现。具体来讲, 受曼海姆影响, 米尔斯认为私人生活与公共议题的整合既有可能造就一个完整的个体, 也有可能使个体倾向于以匿名大众的方式存在, 即从政治参与中撤退, 而只是例行公事地参与一些毫无意义的投票。由此, 通过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等文化工作者挑战既有的社会表征, 米尔斯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在私人生活与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关联, 从而使个体能够在社会结构变迁中思考、理解自己的私人困扰。唯有如此, 个体才能成其为完整的个体。显然, 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科学家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 不过更为理想的状态是普通个体也能具备这种心智品质, 这即是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至此, 基于同一份经验调查, 米尔斯与拉氏最终走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拉氏在《人际影响》中声称, 意见领袖具有重要的人际影响, 其暗含的是美国自由多元主义民主; 米尔斯则在《权力精英》、文化机器研究中提醒我们警惕权力对大众媒介、文化机器的涉入, 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个体意识和作为整体的社会人格类型、社会结构的影响。不过, 正如彼得斯 (1989) 所言, 《人际影响》究其本

质只是用来抵制大众社会噩梦的“武器”。蒂莫西·格兰德（Timothy Glander）则更为尖锐地指出，“两级传播流”理论并不是理解大众媒介之于个体或社会影响的理论，而是被宣传家用来制造统一的“实践工具”（Glander, 2000: 219）。面对《人际影响》与其暗示的民主意义之间的断裂，彼得斯（1989）曾感叹，“如果早期美国传播研究对政治性叙事没有那么严格的抑制的话，我们得到的理论在政治性-理论性承诺上就要远比今天的更加连贯（coherent）”，而这实际上正是米尔斯在50年代努力践行的。超越《人际影响》，将“公众共同体”与“大众社会”作为两种“理想类型”，米尔斯对大众媒介、文化机器的论述在比较的、历史的视野下，沟通起了“社会结构”与“个体心理”“历史时代”与“个人境遇”，在对权力问题保持高度自觉的同时，又在其中发掘出了变革的可能性（Glander, 2000: 226）。可以说，米尔斯的传播想象是一名知识分子为解决彼时美国民主危机做出的个人努力，与此同时这种努力也为传播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即对公共传播进行“比较性-历史性”的研究（Koller, 2008: 1）。⁶

（责任编辑：周楚琚）

注释 [Notes]

1. 在此情况下，米尔斯的补救措施是，将样本中既给别人提出过意见、也向别人征求过意见的人确定为中介者（relayers），并由此向上追踪意见领袖，向下追踪被影响者，以形成一个由三个人组成的意见影响链条。根据这一方法，米尔斯遇到了一场“技术悲剧”——尽管在时尚领域得到了相应的数据，不过该数据非常庞大，根本难以处理。紧接着，米尔斯尝试通过意见领袖的自我指认来推导出关于意见领袖的“宏观概念”。具体的操作是：对意见领袖链条中的意见领袖询问“最近是否有人征求过你的意见”、“你觉得你自己是否比你认识的其他女性更多地被别人征求意见”这两个问题，并将其与样本进行比对。米尔斯发现，意见领袖链中的意见领袖的确比样本更多地将自己确认为意见领袖，并且样本中能够提供其信任的意见领袖的名字的人也比不能提供的人更容易将自己确认为意见领袖。由此，米尔斯认为，为自我指认的意见领袖设定的问题是有效的。（见于Mills, C. W. (1946a, December 29). The influence study: Some conceptions and procedures of research.）
2. 不过，在此情况下，由于意见领袖链是政治领域的，但关于具体意见影响流的“大数据”（big number）是时尚领域的，因此仍然没有办法对“想象的意见领袖”与具体事务中的意见领袖的社会阶层进行对比。有意思的是，米尔斯将具体事务上的意见流形象地比喻为“管道”（Vessels）。（见于Mills, C. W. (1946a, December 29). The influence study: Some conceptions and procedures of research.）
3. 不过，判断米尔斯是该报告的作者不仅仅是因为时间一致。同年12月，米尔斯在美国科学

发展协会上汇报迪凯特研究时,对政治领域意见影响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也沿用了此报告中的量表及数据。事实上,米尔斯后期在《白领》、《权力精英》、《社会学的想象力》等著作中对政治冷漠的阐释框架也与该报告一致。此外,在该报告的首页上,有一行手写的字迹标注此报告为“第二章第六部分”(Part Six Chapter II),而在解释政治冷漠的形成原因时,有一行注释标注该部分内容可以“见于第一章第三部分:‘女性,冷漠与政治’”(See section 3, Chapter I: “Woman, Apathy, and Politics”)。因此,可以推断,这份报告应该是米尔斯的迪凯特研究的部分内容。

4. 对于选择“特定影响者”而非“一般影响者”,《人际影响》给出的依据是“对某人的影响资格和可信赖程度的高度评估,使得他更有可能产生影响,但因为这类人通常并不容易被他人接触到,所以他们的潜在影响力无法充分发挥。”不过,与其说“一般影响者”无法充分发挥影响力,不如说是《人际影响》先验地将其排除在外。《人际影响》提到,在调查中,调查者要求被访者只能提供那些与自己有面对面接触的人,而不能提及那些拥有显著社会地位但不具备日常接触关系的人。《人际影响》声称,“……来自这些人的影响很容易被接受。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公共事务的‘专家们’很可能与我们的调查对象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见于《人际影响: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 P134-135。)
5.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英文版的出版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关于方法论的论争,米尔斯几乎成为唯一一位捍卫曼海姆观点的人。对于知识/思想的社会属性,米尔斯给出的判断远比默顿等更为彻底。不仅如此,米尔斯还建立起了对知识/思想的社会目标的主动追求。相比米尔斯,默顿等更为看重的是社会学的科学地位。
6. 不过,也有学者曾对米尔斯的研究提出质疑。杰瑞观察到,在迪凯特调查后,米尔斯的研究“越来越强硬,越来越少地以经验性事实为依据”。(见于Geary, D. (2009). Radical Ambition: 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P96.) 欧文·霍洛维茨(Irving Louis Horowitz)认为,米尔斯在研究中的主要取证方式是“第一印象的拼凑”、“偶然的个人遭遇”、“报纸及杂志的剪纸”以及“他人的经验性发现”。在霍洛维茨看来,尽管这些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仍然具有“严重的局限性”。(见于Horowitz, I. L. (1983). C Wright Mills: An American Utopian. P168。)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埃弗雷德·罗杰斯(1997/2002)。《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第1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伯纳德·贝雷尔森,黑兹尔·高德特(1944/2012)。《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唐茜译)(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1951 / 1987)。《白领》(杨小东译)(第1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1956 / 2004)。《权力精英》(王崑, 许荣译)(第1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1959 / 2005)。《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 张永强译)(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汉诺·哈特(1992/2008)。《传播学批判研究》(何道宽译)(第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2007 / 2009)。《传播革命——紧要关头与媒体的未来》(高金萍译)(第1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托马斯·库恩(1996/2003)。《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 胡新和译)(第1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王金礼&秦艺丹(2016)。重塑传播研究的知识边界——美国《传播学刊》专刊“领域的躁动”的思想史解读。《现代传播》,(8), 47-53。
- 伊莱休·卡茨,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2016)。《人际影响: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张宁译)(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Berelson, B. (1956).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In L.D. White(Eds.). *The Stat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p.299-318).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relson, B. (1959).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3(1), 1-6.
- Geary, D. (2009). *Radical Ambition: 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erth, H.H. & Mills, C. W. (1942). A Marx for the Managers. *Ethics*, 52(2), 210.
- Gillam, R. (1975). C. Wright Mills and the Politics of Truth: the Power Elite Revised, *American Quarterly*. 27(4), 461-479.
- Gitlin, T. (1978).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6(2), 205-253.
- Glander, R. T.(2000). *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Cold War: Educational Effect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orowitz, I. L. (1983). *C Wright Mills: An American Utopian*.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 Koller, A. (2008,May). *The Road not Taken: Dewey,Mills,Habermas,and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TBA, Montreal, Quebec, Canada.
- Lang.K. & Lang,G. E.(2006). Personal Influence and the New Paradigm: Some Inadvertent Consequenc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08(1),

157-178.

Lazarsfeld, P.(1969).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 In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ld Bailyn(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pp.270-3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zarsfeld, P.(1972). *Qualitative Analysis: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Mills, C. W. (1946a, December 29). The influence study: Some conceptions and procedures of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Boston. Housed in the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Collection,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Box 10, Fol B0240 “Decatur memos.”

Mills, C. W. (1946b, May). Stratification and Opinion Leaders in Four Areas of Opinion and Activity. Housed in the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Collection,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Box 9, Fol B0240.

Mills, C. W. (1946c, December 31). Memorandum to Paul Lazarsfeld re: The talk in Boston. Housed in the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Collection,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Box 10, Fol B0240 “Decatur memos.”

Mills, C. W. (1946d, December 30). Memorandum to Paul Lazarsfeld re: Implications and Propositions, etc. Housed in the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Collection,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Box 10, Fol B0240 “Decatur memos.”

Mills, C. W(1963a). Two Style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Eds.).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pp.553-567).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3).

Mills, C. W(1963b). IBM Plus Reality Plus Humansim=Sociology.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Eds.).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pp.568-576).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Mills, C. W. (1963c).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Eds.).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pp.577-598).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completed 1950).

Mills, C. W(1963d). Mass Society and Liberal Education.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Eds.).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pp.353-373).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Mills, C. W.(1963e).Culture Apparatus.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Eds.).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pp.405-422).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9).

- Mills, C. W.(1963f).The Decline of the Left.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Eds.).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pp.221-235).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9).
- Mills, C. W.(1963g).Language, Logic and Culture.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Eds.).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pp.423-438).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9).
- Mills, C. W.(1963h). The Social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Eds.).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pp.292-304).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4).
- Mills,K. &Mills,P.(Eds.) (2000). *C. Wright Mills: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orrison, D. E. (2006).The Influences Influencing Personal Influence: Scholarship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08(1), 51-75.
- Peters,J. D.(1986).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13(4), 527-559.
- Peters, J. D. (1989). Democracy and American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Dewey, Lippmann, Lazarsfeld. *Communication*,11(3), 199-220.
- Peters, J. D. & Simonson, P.(Eds.).(2004) .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Key Texts, 1919-1968*.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Sawchuk,K. (2001). The Cultural Apparatus: C Wright Mills’ Unfinished Work.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32(1), 27-49.
- Schramm, W.(1983).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 Retrospective View,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6-17 .
- Simonson, P. (2006) *Introduc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08(1), 6-24. Summers, J. H. (2006). Perpetual Revelations: C. Wright Mills and Paul Lazarsfe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08(1), 25-40.
- Weber, M.(1963). “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Maurice Alexander Natanson (Ed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pp.355-418).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